

批判王中的反动新聞学理論

(初 編)

复 旦 大 学 新 聞 系

1957. 9. 20.

目 錄

办报要有立場	方 晨	(1)
駁王中的反动新聞理論	方 晨	(4)
关于否認報紙是階級斗争工具問題	方 晨	(7)
关于報紙的兩重性	方 晨	(12)
关于列寧的办报原則問題	方 晨	(16)
关于“新聞自由”問題	方 晨	(20)
現代的報紙不是階級斗争的產物嗎?	思 慕	(23)
報紙是階級斗争的銳利武器	甘惜分	(28)
王中的“社會需要”論是反動的	劉 勉	(35)
談報紙的階級性和指導性	馮英子 沈杰飛	(40)
駁右派“理論家”王中的机关報論	魏 庄	(47)
新聞的階級性同商品性	胡乔木	(53)
報紙兩重性的我見	魯 林	(55)
王中為什麼宣揚報紙的商品性?	時 烈	(57)
透視報紙“商品”論的實質	汪海波 胡文龍	(59)
“商品性”考	何 微	(65)
右派的立場、折衷主義的方法	周 天	(68)
新民報的經驗教訓証明了王中論點的危害性	趙超鈞	(71)
我們與新聞界右派之間的根本分歧	楊永直	(75)
列寧的办报原則“過時”了嗎?	沙 英	(85)
粉碎資產階級新聞學復辟的陰謀	李龍牧	(90)
附 彙:		
有关批判和揭露右派分子王中的新聞報道		(97)

办报要有立场

人民日报编辑部在六月十四日发表了“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內的資产阶级方向”。文中指出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在一个时间內利用“百家爭鳴”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現資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两个報紙的一部分人对于報紙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錯誤；他們混淆了資本主义国家的報紙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報紙的原則区别，并指出其他一些報紙的一些編輯記者，一些大学的新聞系教师也有这一种情形。因此，希望大家对这个問題展开辯論，借以求得一致的認訝。

上海新聞事业一向比較发达，報紙很多，还有一家人民电台，此外，复旦大学还有一个新聞系。不言可喻，上海新聞界的動向为全国同业所注视。上海新聞界有一部分人在新聞观点上是与社会主义新聞事业的原則有分歧的，而且在最近一个时期中散布了不少的不良影响。文汇报是在一个短時間內变成了資产阶级報紙的方向不是无因的，所以，有就人民日报提出的問題予以严肃討論的必要。

資本主义国家有許多人諱言報紙是階級斗争的工具，虛偽地把資产阶级的報紙說成公共組織，民意机关。上海也有一些新聞工作者实质上不承認产生于階級社会的報紙总是階級斗争的工具这一根本原則的。复旦大学新聞系主任王中同志的一些言論，特別值得注意。王中同志采取了一些巧妙的戰術，表面上似乎也講報紙是阶段斗争的工具，实际上是否定了这个原則。他強調新聞事业是社会产物。他說：“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人和周圍的制約关系紧密到一定程度，就迫切需要（了解）周圍事变。”報紙就“随着这种需要的强度与广度而誕生”。他強調說：報紙是

傳布新聞的工具，他可以為政治服務，但不是政治本身。從這裡偷偷地把報紙的階級性刪去了。誠然，報紙要滿足讀者認識世界的要求，但是，這一點也抹煞不了報紙的階級性，資產階級的報紙在報道不利于本階級的事實時，不是掩飾真相，就是歪曲真相，這又如何解釋呢？難道這也是決定於“社會需要”而不決定於它的階級利益的需要麼？王中同志說：黨委很容易忽視報紙的特點，或者仍然習慣於抗戰時期和階級鬥爭時期的做法，對新形勢下報紙應起的作用認識不足，報社如果按着黨委的舊習慣去辦報，便會造成報紙脫離羣眾。王中這一段話充分說明他是不承認目前中國還有階級鬥爭的，拿階級觀點去教育人民，就是舊習慣，就要脫離羣眾。王中還說過，階級消滅以後，報紙就不能說是階級鬥爭工具了，報紙就沒有階級性了。照他的說法，到那個時候，社會主義報紙與資產階級報紙就沒有什麼區別了。難道階級消滅以後，報紙就沒有教育人民，消滅資產階級思想（這是長期存在的）的使命了嗎？難道社會主義報紙沒有它的特色了嗎？《人民日報》編輯部指出的，“社會主義國家，報紙是社會主義經濟即在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通過新聞手段的反映，和資本主義國家報紙是無政府狀態的和集團競爭的經濟通過新聞手段的反映不同”，不是正確地說明了社會主義報紙的特殊作用嗎？人民的報紙不僅有責任指導讀者如何認識世界，而且有責任指導讀者如何變革世界。這是作為階級鬥爭工具的報紙必然具有的使命。我國從清末有現代日報以來，幾乎沒有一家報紙沒有自己的政治立場，沒有一家報紙不用消息與言論去直接或間接影響讀者來接受並實踐它的政治主張：“擁護它所擁護的，反對它所反對的。”而王中同志却有他的奇特主張，他認為報紙有兩重性，“一重是宣傳工具，一重是商品，而且是在商品性的基礎上發揮宣傳工具的作用”。這是和“社會需要論”一脈相承的另一個巧妙戰術，表面說宣傳作用實際取

消这个作用，把办报这件事看得和做生意差不多，所以，王中同志的办报方针就特别强调迎合读者的兴趣。他说：“我们要找到这个东西（按：即读者兴趣）来改进报纸。”诚然报纸是卖给给人看不是送给人看的，然而办报毕竟不同于经商，办报方针毕竟不同于生意眼。人民的报纸不同于资产阶级报纸的地方，首先是以先进的思想和先进的事物去教育读者、鼓舞读者和培养读者高尚的情操，不是以庸俗的趣味去麻醉读者，怎么能片面地主张读者爱看什么就登什么？我们知道报纸的读者有各阶层的人，一般说来总是有先进、中间、落后之分。社会主义的报纸要起人民教科书的作用，它必然要以先进的思想及政治主张去指导读者、教育读者的。如果办报单纯从满足读者的兴趣出发，削弱或者否定了报纸的指导作用，那末，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阵地，必然要被资产阶级思想占领去。所以王中同志的“商品基础论”势必使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迷失方向，甚至走向歧途。

在上海新闻界中，确有一些人一谈到指导性就斥之为“教条主义”，象新闻日报副总编辑陆诒，他在新闻日报大肆宣传资产阶级办报思想，谩骂人民的报纸为“一片教条主义”“真象画符念咒”，一笔抹煞人民报纸工作人员的劳动成果就是一例。在人民的报纸编辑部，如果不承认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反对报纸的指导性，盲目热衷于生意眼，其结果只能是赶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接受资产阶级的指导而已。文汇报、光明日报以及其他一些报纸，在大鸣大放期间，发表了带煽动性报道和反共言论的这一事实，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么！

党报和党外报纸在风格上应该有所不同，但是，办报的基本方向是一致的，同是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因此，一切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一切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一切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

与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的思想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正如人民日报编辑部所指出的，在新闻工作中要作反“左”反右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因此，对教条主义的新闻观点及八股文风，也应当加以批判。我们解放日报在这方面犯的错误比较多些，至于反映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消息与文章也不是完全没有，我们除自己检查外，并请上海同业多多指教，尤其希望本报读者加以督责。

（1957年6月16日解放日报社论）

驳王中的反动新闻理论

方 墨

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近一年来在新闻界大量地宣传资产阶级新闻学的反动理论。王中以大学教授的身份，到处作报告，作讲演。他曾先后在南京新华日报、山东大众日报、上海解放日报作过报告，把资产阶级新闻学宣传得天花乱坠，雨石缤纷。一九五七年一月廿四日，二月廿八日，三月廿一日王中对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人员连续作了三次“讲授”。讲授的题目叫做“新闻学原理大纲”。这篇讲授，更加有系统地、有“理论”地宣传了资产阶级新闻观。王中用了不少心机，打算把他的意见讲得“滑头一些，不露痕迹”，然而，王中的反动理论，实际上以一种肆无忌惮的姿态，公开地向社会主义的报纸展开了进攻。教授的头衔，党员的称号，学术的招牌，曾经在新闻界迷惑过一部份同志。复旦新闻系不少同学，在教授“学术”影响之下，斥党报为“寡妇脸”，为“不学无术”，为“教条主义”，不少新闻系学生要走“同人报”的路，走资产阶级的路，不愿走社会主义的路，不愿为社会主义新

聞事業服務。王中“學術”產生了極壞的影響，這種壞影響與新聞界若干人原來就有的資產階級辦報思想合拍，有人聽過他的演說，為他拍過手，叫過好，稱譽過他的“學術”研究精神，並願意為實現他的新聞學理論而終身奮鬥。對於王中的反動理論，必須加以駁斥。

王中的基本論點之一，是說“報紙是一定社會的產物，它決定於社會的需要，而不決定於辦報人。它發展的規律是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變化的。不是隨著階級關係的變化而變化的。它不是完全和政治鬥爭的變化相吻合的”。

說報紙是社會需要的產物，對不對呢？不能批評這種說法是完全不對的。因為近代報紙確實是社會發展到一定的階段才出現的。正如蒸汽機直到十六七世紀英國資本主義開始興盛時期才出現一樣，沒有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沒有造紙工業的發達，沒有印刷機器制作的進步，沒有交通電訊器材日新月異的改進，近代報紙的產生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承認這一點，那就不是唯物主義者。但是真正的唯物主義者還必須認識，所謂“社會需要”，並不是一個籠統、抽象的概念。社會需要是具體的需要。社會分裂為階級以後，社會是由各種敵對階級組成的。在奴隸社會，有奴隸和奴隸主兩大敵對階級，在封建社會，有地主與農民兩大敵對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有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敵對階級。其他各社會階層，都從屬於各个社會里兩大敵對階級。所謂“社會需要”，既有奴隸主、地主、資本家的需要，也有奴隸、農民和工人的需要。當然也有為這個階級服務或為那個階級服務的某些階層的需要，譬如一些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子、文人墨士的需要，就是如此。

由於需要的基本不同，各個敵對階級的利益不同，因此，所謂“社會需要”就不能離開階級的利益、階級的觀點去考察。

人們生活在千变万化的世界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人們要求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阶级立場，不同的阶级利益来了解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不断变革的社会里所发生的事情。

所謂新聞，总是发生在人类社会的各式各样的事情。所謂新聞，无非是人們为获得生活資料与生产資料所进行的生产斗争，以及圍繞着生产斗争而发生的政治斗争，思想意識形态斗争的种种事情的反映。美国竞选，南美洲某一国家发生政变，納賽尔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国开放禁运，苏联建設裁軍，我国的整风运动、反右派斗争，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成就、五年計劃的提前完成、长江大桥的建設等等新聞，无不属于生产斗争、政治斗争、思想意識斗争的范畴。当然，也有一部分新聞，就其事实看是没有阶级性的，如火山爆发，某处失火，台风过境，电車出轨，游泳溺死等等。又如体育、科学技術、語言、文字等等往往本身也没有阶级性。但是在阶级的社会里，報紙对于这些新聞的选择和处理，由于立場、观点、方法的不同，选择的角度和处理的结果也就不同。社会主义報紙要把电車出轨、游泳溺死、台风过境等等新聞加以正确的处理，指明发生这些事情的原因，分析改进工作、加強防御措施的办法，目的在于教育人民，而不在于求新奇，求刺激，幸灾乐禍，或者完全采取“有聞必录”的客觀主义的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选择与处理的不同，因为報紙不仅仅是根据抽象的社会需要而办的，報紙是根据具体的阶级需要，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場，反映一定阶级观点的。

如果象王中所說的那样，報紙的发展規律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而不是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那么請問，社会的发展的动力，离开阶级斗争，又如何能夠发生变化呢？如果说報紙只是什么抽象的“社会需要”，而不是反映了阶级社会里各种不同的阶级的需要，那么“社会需要”論，不是打算掩盖阶级社会

里的阶级矛盾又能是什么呢？王中認為“报纸不是完全和政治斗争的变化相吻合的”。按照王中的理論，无产阶级的报纸就該脱离政治斗争，无产阶级的报纸就該脱离党的领导。按照王中的意見，“报纸办得怎样，不决定于办报人”，那末，无产阶级的报纸可以交给资产阶级中的任何一位人物去办了，光明日报、文汇报交给储安平、徐铸成按照资产阶级右派的意图办下去也就是天經地义了。

（1957年8月4日解放日报）

駁王中反动的新聞理論之二

关于否認报纸是階級斗争工具問題

方 墓

王中的基本論点之二，是說：“报纸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把报纸仅仅理解成阶级斗争的产物，那就意味着报纸的使命就是阶级斗争。”

什么叫阶级斗争的产物呢？王中在这里玩弄着名詞，演变着戏法。他希望在“产物”两个字上作文章，以达到迷惑视听的目的。

当然，报纸如果作为紙張、印刷來說，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結果，它本身沒有阶级性，一張白紙可以为这个阶级服务，也可以为另一个阶级服务。但是，一旦在白紙上写上黑字，它就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了。资产阶级在这張白紙上要写下资产阶级觀點的黑字，无产阶级在这張白紙上要写上无产阶级的意見。这就是說，只要各种阶级意識，阶级的觀点，阶级的政策和主張，用文字印刻在报纸上，报纸就立刻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了。有些看起来与阶级斗争无直接关系，但阶级按其需要来选择，它还是有

階級性。在這個意義上說，報紙已經不是原來的那張白紙了，而是有立場、有觀點的報紙，如果說這種有立場、有觀點的報紙是階級鬥爭的產物也是不錯的。

為什麼王中那樣熱心反對報紙是階級鬥爭產物這一說法呢？

（我們不知道這種說法是怎麼來的，因為我們所常常說的是報紙是階級鬥爭的工具）。王中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呢？顯然王中的目的不在于討論什麼“產物”問題，而在于要用這種似乎是學術問題上的研究，來從根本上反對報紙是階級鬥爭的工具這一著名的無產階級新聞學的原理。我們且看王中下列的理論，假面具就不難揭露了。王中認為，“把報紙看成階級鬥爭的產物，那就意味着報紙的使命就是階級鬥爭，報紙的任務就是階級鬥爭，報紙的生存價值就是階級鬥爭，報紙是將要隨着階級鬥爭的消滅而消滅，這是一種荒唐的說法”。我們說報紙是階級鬥爭的工具，他說這是荒唐的說法。究竟是誰荒唐呢？報紙的使命、任務不是階級鬥爭，難道仅仅是什么溝通消息嗎？所謂溝通消息，又是溝通什麼樣的消息呢？王中在這裡完全暴露了他取消報紙是階級鬥爭工具的反動觀點。當然，王中可以辯解，說並沒有這個意思，王中不是也說過，無產階級的報紙一開始就是階級鬥爭的工具嗎？不錯，王中是說過這類話的，但他說這類話的目的是在騙人，確實也有人被他騙住了，認為他的理論有“正確”的部分。然而，王中的“正確”部分是為着替自己的反動理論作裝飾的。我們且看，王中以下的言論就可更加明白了。他說，“但不能夠用這一點（指報紙是階級鬥爭的工具）推到歷史上任何的最早的報紙。”那就是說在早期資本主義社會里，在封建社會里的報紙就不是階級鬥爭的工具。王中認為，“報紙在資本主義社會是輔助資產階級民主的工具”。什麼叫資產階級民主呢？報紙如何輔助呢？資產階級民主不是資產階級專政的代名詞嗎？報紙是輔助資產階級民主的工具，

不就是資產階級實行專政的工具嗎？報紙在資產階級手里不是資產階級鬥爭的工具又能是什么呢？

我們說，報紙在任何时候只要是在階級的社會里，只要全世界還存在敵對階級，報紙總歸是階級鬥爭的工具，即令階級也完全滅絕了，如果階級的意識，敵對階級的思想影響還沒有完全滅絕，報紙仍然具有階級鬥爭，思想教育的使命。

事實上不仅是報紙，就是通訊社、廣播電台同樣是階級鬥爭的工具，可是王中對通訊社怎樣看呢？他把通訊社看成是收集新聞賣給報館的一批吃報館飯的人，他公開声称廣播電台不是一個階級鬥爭的工具。王中的野心不光是要改變社會主義報紙的方向為資產階級的方向，王中還要改變國家通訊社的方向，改變國家廣播事業的方向，王中比起儲安平、徐鑄成、浦熙修之流是更加猖狂、更加凶惡的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言人，資產階級右派的理論家，彻頭徹尾的右派分子，難道還不淺顯易見嗎？

可是王中並不是什麼高明的理論家，他是一個蹩腳的理論家，他錯誤地引用了許多古代的報業史來論証他的理論。他洋洋得意地問道：“希臘的斯巴達克暴動時，斯巴達克辦了什麼報？奴隸主辦了什麼報？農民暴動最尖銳、規模最大的太平軍也沒有用報紙來進行階級鬥爭。可見報紙不是階級鬥爭斗出來的。”王中自以為拿出歷史既可以炫耀自己，又可以吓唬別人。王中真的懂得什麼歷史嗎？誰不知道在奴隸社會就沒有近代的報紙，斯巴達克也好，奴隸主也好，都不可能運用近代報紙來宣傳各自的主張。太平天國的農民起義，雖然當時沒有近代的報紙做為階級鬥爭的工具，可是太平軍却运用了其他各式各樣的宣傳工具進行了鬥爭。如太平天國時代有“醒世文”“誅妖檄文”“千字詔”“天情道理書”“三字經”等等。它同樣起了階級鬥爭和宣傳太平天國主張的作用。“博學”的王中先生，應該知道，我國近代報紙的產生，是隨着外

国資本主义势力侵入而俱来的，我国最早的近代報紙就是外国人办的。他們在中国办报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不是把報紙作为侵略中国的宣傳工具嗎？

中外历史的真实情况与王中所說的相反。不信且看一段記載：

“美洲大陸第一架印刷机于一五三五年出現于墨西哥，直到一世纪后，即一六三八年，才在北美的英國各殖民地，即現在的美國，設立第一个印刷所。在英殖民地第一次嘗試的報紙‘公众事件’，于一六九〇年九月廿五日在波士頓出現。它的壽命不長，只出了一期。它在出現四天之內，就被总督和行政会正式下令封閉。因为該報載有譏諷法国君主的言論和批評在北美洲的一次軍事遠征的評論，引起英帝国代表人物的盛怒”。（見阿貝·察佩克著“美國新聞界”）这一段記載，完全証明，近代報紙一出現就成為階級鬥爭的工具。英帝国代表人物是什么階級的人物？英殖民地的報紙代表什么階級的利益說話？英殖民者为什么要封閉它？难道王中的“历史”能否定这个历史嗎？外国如此，中国也不例外。

光緒廿四年，慈禧太后对于攻击帝制的報紙一律加以封閉，說是“莠言亂政，最为生民之害”。清末，清廷对于鼓吹革命的報紙无不加以禁止，認為这都是“誹謬什輿”，甚至禁止人民閱報。宣統三年，汉口大江報以時評題為“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被封，鼓吹革命的詹大悲被監禁。袁世凱北洋軍閥時代被封報紙达八十余家。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釗同志所主办的“每周評論”發表了一篇題為“司法獨立與教育獨立”的文章，主張司法不应作軍閥的“魔犬”，北京司法總長朱深立即派武裝加以封閉。一九一九年，毛主席主編的“湘江評論”，出了四期就被湖南省長張敬堯封禁停刊。一九二〇年反動統治者下令郵局停寄“新青年”。

在国民党反动統治时期，国民党中宣部公布宣傳品审查标准，規定凡宣傳共产主义，便被认为反动，凡批評国民党不抵抗政

策，要求抗日者，便是危害中华民国。国民党对新闻事业的摧残，其凶恶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为什么？因为这个时代正是我国国内阶级斗争处于空前激烈的时代。在这个时期里，被国民党查禁的报纸几乎难以计数。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大众生活”，杜重远办的“新生”，郭沫若创办的“救亡日报”，或被查封，或被迫停刊。一九四六年二月廿二日，国民党特务捣毁新华日报、民主报，造成震动全国的二·二二事件，更是尽人皆知的。一九四六年四月三日国民党北平当局派大队宪兵包围解放报、新华社，进行非法搜捕，捕去该社工作人员卅余人，并沿途殴打。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期间，被杀害的进步的记者、编辑也难以计数。名记者羊枣就死于蒋介石的监狱中。文萃三烈士陈子涛，吴承德、骆何民在上海解放前夕被害。这都是著名的事件，这都是铁证如山的历史。国民党反动派摧残新闻，蹂躏记者人权，垄断舆论究竟为了什么目的？不是为着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国人民，以期把报纸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把报纸一概作为买办大资产阶级、封建大地主喉舌的目的，又能是什么呢？为什么王中不谈这些历史呢？岂不是因为这些历史的本身就论证了王中的报纸不是阶级斗争工具论是彻头彻尾的撒谎吗？报纸既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要运用报纸，进行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的报纸就不能离开共产党的领导。要反对党对报纸的领导，首先就要反对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的这一根本原则，王中的理论阴谋，其目的就在这里，王中反党理论的核心，也就是这个问题。

（1957年8月5日解放日报）

駁王中反动的新聞理論之三

关于報紙的兩重性

方 景

王中另一个反动的理論，是所謂報紙的兩重性。他認為“報紙具有兩重性，一重是宣傳工具，一重是商品，而且在商品性的基礎上，發揮宣傳工具的作用”。其實，所謂商品性這種論調，并不是王中的創見，資產階級的新聞理論早就這樣說過的；不仅說過，而且他們正是這樣的自我標榜。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的報紙和通訊社，都一再宣稱它們是為社會的、公共的需要服務的；說它們是私營企業組織，是“商業報紙”、“商業通訊社”，甚至到處聲明，他們的報紙是“非官方”的，“不為某一政治集團服務”，他們的消息也不受任何政治偏見的影響。

實際上，這種綴滿了金錢的商業外衣，是掩蓋不了資產階級報紙作為資產階級的宣傳工具，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這一事實的。我們不否認，在今天的資本主義世界，報紙和整個新聞事業是被當作商品在經營，許多大資本集團由於壟斷和經營報紙，已使他們獲得了大量的商業利潤。但我們決不能因此就認為報紙就只是資產階級用來賺錢的商品，和石油、汽車、可口可樂等商品毫无任何差別。不是的，資產階級決不是仅仅為了商業利潤才來壟斷報紙，他們最大的目的，還在於利用報紙來作為他們維護本身利益和進行階級鬥爭的武器。在資產階級看來，在現代國內外階級鬥爭異常尖銳的情況下，只有在經濟上壟斷了整個新聞事業，控制着報紙、通訊社、電台、電視這些有力的宣傳工具，才能更好地發揮它們在政治鬥爭中的作用，達到他們統治和麻醉人民羣眾的目的。很明顯，對於那些大資產階級壟斷集團來說，所

謂商業利潤也好，經濟利益也好，事實上都是和他們的政治利益、階級利益不可分割的，都是為了維護和发展資本主義，都是為了鞏固資本主義私有制的。

資產階級的新聞理論家所以強調報紙的商品性，絕口不談報紙作為階級鬥爭的工具，他們是別有用心的。他們的目的就在於企圖宣揚他們的新聞事業是“超然的”、“自由的”、“客觀公正的”、“與政治无关的”等等，以這些騙人的幌子來掩蓋報紙的階級性，抹煞報紙是階級鬥爭工具這一本質問題。

王中不僅完全販賣了這種早已破產的資產階級的新聞理論，並且把它加以發展，他把資產階級的謠言和無產階級的真理，標新立異的混在一起，提出了所謂報紙的兩重性。他認為社會主義的報紙和資本主義的報紙同樣都是商品，王中這樣說是什麼意思呢？那就是說，按照王中的理論，報紙必須首先是商品，商品性是基本的，第一性的東西；而宣傳工具的作用是次要的，是必須服从商品性這一前提的。他認為資產階級正因為懂得這個道理把報紙當作商品來辦，所以新聞事業很發達，報紙很受讀者的歡迎。而無產階級的報紙由於忽視了商品性這一點，“老是啃住就是階級鬥爭工具”，因此“一片教條主義”“鐵青的面孔”“對不起讀者的五分錢”，於是，連王中這個共產黨員都不要看了。

報紙究竟是不是商品呢？如果從報紙的流通過程來看，報紙要計算成本，要定價銷售……等等，它似乎具有相當程度的商品性，但不能得出結論說報紙就是商品，正如電影戲劇在劇院演出時要賣票，學生進學校要交學費，但不能因此說電影戲劇藝術甚至學校都是商品一樣。凡是讀過歷史唯物主義的人，都懂得這個道理。在“歷史唯物主義”一書中這樣寫着：“……報刊、學校、俱樂部、劇院、電影院、廣播電台、圖書館和博物館，所有這些機關各自用自己所特有的工具以共產主義精神教育社會成員。构

成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观点和制度，都是为保障、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即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事业服务的。”（历史唯物主义一四一页，康士坦丁諾夫，人民出版社）

我們說报刊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从来沒有人說过它是商品。所謂上层建筑就是政治的、宗教的、法律的观点、思想和制度，社会的基础决定社会的上层建筑，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和特点，经济基础发生变化，上层建筑也随之变化，但是上层建筑乃是一种积极的力量，上层建筑决不只是消极的反映基础，中立的对待基础的命运，它是一个偉大的力量，它努力形成和巩固自己的基础，采取一切办法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报纸这种上层建筑的作用，就不是什么商品所可与之比拟的。

无产阶级自从有自己的新闻事业的第一天起，就把报纸当作阶级斗争和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群众的工具，从来也不隱諱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而且把进行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的巨大使命，作为报纸的神圣职责和战斗任务，并以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服务。因此，在我們看来，不論在任何情况下，报纸都是阶级斗争的武器，而不是什么商品。报纸和读者的关系一方面报纸是群众的良师益友，另一方面也是群众自我教育的工具。

王中把报纸看作商品，把报纸和读者的关系看作“五分錢的买卖关系”，看作是“办报卖”和“买报看”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很显然，他的目的和资产阶级一样，就在于取消报纸具有阶级性这一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在他看来，报纸就应该象商品一样是没有阶级性的。读者需要报纸就象需要一盒火柴、一瓶牙膏一样。“读者是报纸的顧客”，报纸工作人员是“办报卖”的商人。因此报纸不应该按照办报人的阶级观点来办报，而应该按照“顧客”的需要来办，“顧客”要什么貨色，报纸就給什么貨色，“人們出錢买的是商品，商品就該为人民服务”。难怪乎王中主張

報紙應該“刺激”應該“遊戲”應該“風花雪月，鴛鴦蝴蝶”……等等。甚至他認為“黃色新聞”“色情新聞”都“有它的社會根源”和“發展因素”，都是適應讀者的需要而產生的，因此不可厚非，“現在如果你辦報想發財，搞點黃色，可以鑽這個空子”。總之，他認為“報紙要根據讀者的需要來辦”“這是办好報紙的根本問題”，也是“報紙發展的基本規律”；否則“離開了讀者的需要，報紙必然不會受到讀者的歡迎”。

這就是王中所主張的商品性。而這種荒謬的論調，正是和他的“報紙是社會的產物，決定於社會需要”等一系列的資產階級觀點一脈相承的。不管他用怎樣的花言巧語，但事實上他是向無產階級的辦報路線進行挑戰。如果按照王中的理論，那就是說：報紙既是社會的產物，決定於社會的需要，你就不應該強調它的黨性和階級性；報紙既是商品，就不應該把它當作黨的宣傳武器或階級鬥爭的工具。因此他認為報紙不能象現在這樣辦下去，不應該強調什麼教育作用，指導作用，中心工作……而應該強調服務性、娛樂性，強調如何適應“顧客”的需要。“報紙要改進工作，也應該根據讀者（顧客）的意見來改進，不能根據黨委的意見辦事”。在這一點上，王中更露骨地提倡向資本主義國家的報紙學習。

綜觀這些論調，我們便不難看出，王中所謂的報紙的兩重性，事實上是一個徹底否定無產階級新聞學的極其反動的理論。它的目的，就在於以“報紙是社會的產物”來否定報紙的階級性，以“商品性”來否定宣傳工具的作用，以“讀者的需要”來否定黨對報紙的領導，以庸俗的買賣關係來反對報紙對人民羣眾的指導和教育……。大家看，這裏面有什么兩重性，所有無產階級新聞學的重要特點，全部被他用資產階級的新聞理論代替了，因此，實際上只有一重性，那就是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的辦報方向！王中